

1939年日蘇「諾門罕戰爭」研究

The Battles of Nomonkhan (Khalkhyn Gol) in 1939

謝志淵 (Chih-Yuan, Hsieh)

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中校教官

提 要

1939年日蘇於蒙古地區發生諾門罕戰爭，就相關文獻研究分析，其源起大概可區分兩種因素，其一為地緣戰略競爭，其二則為戰略利益衝突；有關滿蒙邊界爭議，幾乎可以確定是兩國衝突不斷的起因，而非目的；兩國意圖於國境未確定地區擴大勢力，實造成衝突糾紛事件不斷的起因；多數專家認定是蘇軍贏得此次戰爭，但究其獲勝原因實包括軍事戰略指導、情報與反情報、後勤能力、作戰理論以及科技發展等重要要素；諾門罕戰爭的歷史意義與影響，包括「一場陌生的戰爭」、「一場遺忘的有限戰爭」、「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格局的局部戰爭」、「蝴蝶效應」、「亞洲第一次坦克大戰」及「第一次陸空立體作戰」等等，評價雖各有不同，但卻有助於深入了解諾門罕戰爭的重要性。

關鍵詞：諾門罕、哈拉哈河、北進論、南進論

Abstract

In 1939 the battles of Nomonhan, between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took place in Mongolia region. According to research result, it probabl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kinds of factors, one is for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the other is the conflict strategic interest; Regarding the border dispute between Manchukuo and Mongolia, it almost certainly the cause of conflict between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but not the end; both intent to expand their influence in the unidentified area; Majority of experts believe that Soviet Union won the battle and the reason included military strategic guidance,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logistical capacity, operational theory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o on; The meaning and influence of the battle of Nomonhan include: "A Strange War", "A Forgotten Limited War", "a local war to change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War II", "Butterfly Effect", "The first time tank warfare in Asia" and "The first time air-ground 3D combat". All they have different evaluations, which however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Nomonhan.

Keywords: Nomonkhan, Khalkhyn Gol, Northern Expansion Doctrine, Southern Expansion Doctrine

壹、前言

1939年日蘇兩國因邊界爭議於蒙古諾門罕地區發生一場看似「陌生」，但卻異常激烈且影響深遠的戰爭。對於何以兩國於如此偏僻地區發生軍事衝突，實源自於兩國間的歷史因素與國家利益衝突。就作戰結果言，外界雖普遍認定是蘇軍贏得此次作戰，然而，至於什麼才是決定兩軍的勝敗重要因素，本文從軍事戰略指導、情報與反情報、後勤能力、作戰理論發展，以及軍事科技發展等因素，綜合評析何以日軍戰敗而蘇軍能獲勝之原因。最後，對於戰爭所產生何種影響，綜整不同的評價與觀點，並予以客觀分析，期能對此戰爭於歷史上的價值，能有更客觀而深入的了解。

貳、戰爭歷史背景

每一場戰爭的發生都有其特殊的背景因素，因此對於1939年日蘇於蒙古地區發生「諾門罕戰爭」乙事，就相關文獻研究分析，可區分兩種因素，其一為地緣戰略競爭，日蘇兩國因各自追求戰略安全引發衝突，其二為戰略利益衝突，兩國為擴張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殖民利益引發戰爭。

一、地緣戰略競爭

蒙古國防部軍事科學院米格爾桑布博士指出：戰爭的起因與當時參戰的蘇聯和日本這兩個大國的地緣政治策略有關。對蘇聯而

言，蒙古做為其重要的地緣戰略地的意義，在於蒙古國長期為蘇聯鞏固遠東地區安全、保衛西伯利亞漫長邊境線的重要屏障。因此，1912年蒙古在蘇聯的支持下宣布獨立，¹並於1934年11月27日俄蒙更締結「有關相互援助之紳士協定」，明確議定兩國在受到攻擊或威脅時，應相互提供軍事上的援助等合作關係，相關內容如下：²

第一條：兩國領土若受到攻擊或威脅時，兩國得以研討情勢，以謀求維持領土安全之一切必要措施。

第二條：締約國之一方，若受到軍事上的攻擊時，兩國應互相提供包含軍事援助在內的一切支援。

第三條：為履行上述第一、第二條的義務，宜比照1925年俄軍自外蒙古撤回之情形一樣，凡駐紮於締約對方國領土內之另一方軍隊，於解除駐紮之同時，應即刻自該領域內撤回。

第四條：本議定書自簽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間定為10年。

對日本言，由於海島國家地理環境因素，除自然資源有限的發展限制，加以主觀安全意識的影響，向外發展與獲取資源成為重要的發展途徑。因此，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幾次對外作戰均能獲勝，鼓舞了日本不斷向外擴張的野心，並訂定四個國家戰略目標包括：³

(一)維護日本本土安全。

1 1912年當國父孫中山先生正為推翻滿清發起辛亥革命之際，外蒙古在蘇聯的支持下宣布獨立，蘇蒙之間的關係亦日趨緊密。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國誕生，其一切國家組織型態完全採用蘇聯模式，並將國境除面臨蘇聯的北方邊界開放外，餘均予以關閉。1934年11月27日蘇蒙更締結「有關相互援助之紳士協定」，明確議訂兩國在軍事上的合作關係。參閱方志祿譯，《九一八事變與關東軍—關東軍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8)，頁590-594。

2 同註1，頁458-461。

3 張錫模，〈地理的威權—日俄戰爭的地緣政治〉，《當代》，第214期，2005年6月1日，頁21。1868年明治維新

(二)控制日本各島嶼的近海。

(三)自亞洲大陸或東南亞取得礦藏與資源，藉以維持日本的經濟生存和發展。

(四)維持日本在三個「湖」（日本海、東中國海與南中國海）的海洋霸權，也就是維持在西太平洋的霸權。

因此，我國中山大學教授張錫模即認為，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及1904年日俄戰爭的勝利，鼓舞日本的統治階級全力推進第三戰略目標，旋於1910年吞併朝鮮半島，並

著手侵略與併吞滿州與蒙古大計。⁴另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Paine則認為，1930年代日本因受蘇聯領土與意識形態擴張主義威脅，認為如果日本自滿州及內蒙古撤退，蘇聯將進入此一地區威脅日本的國家安全。⁵

據上，除歷史因素外，實根源於日本侵略性的戰略企圖與蘇聯安全戰略衝突所致，加以彼此的不信任，1935至1938年間，邊界事件則不斷的逐次升級衝突（如表1），加以日本主觀判斷認為，時機有利於向蘇聯

表1 1935-1938年日俄邊界衝突事件統計表

年月	事件	衝突概要
1935年1月	哈爾哈廟事件	外蒙軍佔領哈爾哈廟附近地區，駐海拉爾滿軍欲奪回致發生衝突。當雙方交涉未果，日軍出兵之際，外蒙軍主動撤退結束。
1935年3月	長嶺子事件	日軍斥候隊於長嶺子調查國境時，遭蘇聯境警備隊射擊，遂發生衝突。日雖向俄提出抗議，但未獲解決。
1935年6月	楊木林子事件	日軍斥候隊於楊木林子邊境巡邏，遭蘇聯境警備隊射擊，遂發生衝突。日圖循外交途徑交涉，但遭俄拒絕。
1935年6月	海拉斯丁格爾（霍爾斯天河）事件	關東軍測量隊於霍爾斯天河從事測量作業，遭外蒙軍越界逮捕測量隊。當雙方交涉未果，日軍出兵之際，外蒙軍主動撤出結束。
1935年12月	奧拉霍德加事件	日軍為驅逐外蒙軍經常性越界行為，令乙支隊向奧拉霍德推進與外蒙軍發生戰鬥。
1936年1月	金廠溝事件	日軍認為滿州駐紮於金廠溝部隊兵變，係受俄煽動引起，要求引渡叛逃部隊，但未獲俄方回應。
1936年3月	塔烏蘭事件	日軍為確保邊界安全，令乙支隊對越界外蒙軍實施攻擊，並於塔烏蘭附近發生戰鬥，重創外蒙軍。
1937年6月	乾岔子島事件	日俄因黑龍江國界河中島嶼（中洲）主權歸屬問題而引發紛爭；俄軍登島要求島上滿人撤離，引起衝突；衝突結果俄軍撤離進佔小島。
1938年7月	張鼓峯事件	日俄因張鼓峯附近國境線見解不同，遂發生激烈衝突，最後兩軍考量「不擴大事件」，於莫斯科締結停戰協定結束。

資料來源：方志祿譯，《九一八事變與關東軍—關東軍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8年6月），頁455-567。

與1873年的「西南戰爭」，日本基本上已實現日本本土安全的第一個戰略目標。明治初期的海軍建設，實現近岸防衛的第二個戰略目標。然而明治維新所推進的工業化，加速實現攫取與確保海外資源的第三個戰略目標，卻又與西太平洋霸權第四個戰略目標相連繫，促使日本走向帝國主義的擴張之路。

4 同註3，頁23。

5 S. C. M Paine, "Russo-Chinese Myths and Their Impact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30s," Hokkaido University Collection of Scholarly and Academic Papers (Japan: 2004), p.6.

發起武裝挑釁，誘發這場戰爭。因此，1938年7月，日軍向哈桑湖地區發動攻擊事件（我國稱「張鼓峯事件」⁶，俄稱「哈桑湖事件」，英文：Changkufeng Incident，俄文：Хасанские бои），可謂是1939年「諾門罕戰爭」潛因，亦可謂之為前哨戰。

二、國家利益衝突

日蘇間的衝突，除地緣戰略因素外，中國東北地區利益亦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有關邊界的爭議最早可回溯至200年前，與蒙古為確保稀有水源及蘇聯逐步入侵中國有關，遂造成爾後日蘇兩國擴張主義的衝突，⁷包括1904年日蘇戰爭之歷史因素，以及1935至1938年間各種因邊界認知差距所引發小規模軍事衝突，名義上的「滿蒙」（蘇聯於1912年支持蒙古獨立，日本則於1931年扶

植偽滿州國）邊界爭端，實則是日蘇兩國戰略利益衝突所致。因此，1939年日蘇諾門罕戰爭的發生，並不是某一國家意圖侵略另一國，而是兩國為了維護和擴大局部地區內的國家利益所引發。

日本以「918事變」為契機，派兵侵入我國東北，並扶植成立偽滿州國後，直接威脅蘇聯在遠東的利益，促使蘇聯不得不考慮對日侵華不干涉政策的調整。加以1936年6月日本的「帝國國防方針」（又稱帝國國防政策，⁸日文：ていこくこくぼうほうしん）將蘇聯列為第一敵對國，8月制定了「北進」（北進論；Northern Expansion Doctrine）與「南進」（南進論；Southern Expansion Doctrine）⁹的「國策基準」¹⁰（又稱基本國策綱要），繼於11月25日，又與德國締結「反共產國際協

6 所謂張鼓峯事件，是指1938年7月29日至8月9日日本與蘇聯為爭奪張鼓峯和沙草峰而發生的一場邊境軍事衝突。交戰結果，日軍慘敗，不得不向蘇聯提出停戰建議，並於8月10日協議正式停火。申文勇，〈諾門罕事件對日本南進北進政策的影響〉，《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9月25日，〈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detail_2010_09/25/2618652_0.shtml〉（檢索日期：2013年1月20日）

7 Christopher D. Bellamy and Joseph S. Lahanstein, *The New Soviet Defensive Policy: Khalkhin Gol 1939 As Case Study* (U.S. Army War College, 1990), p.21.

8 帝國國防方針是軍事發展上的戰略；日本國防政策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描述軍備需要；第二部分軍事政策目標的作為具體，即所需的勢力分裂目標，如戰艦的數量已經建立；第三部分為綱要規劃策略，主要針對日本的敵人。

9 「北進」主要是以日本陸軍為主導的對外侵略擴張戰略，其最終戰略目標是以中國大陸為腹地，向西伯利亞擴張，主要防衛對象是蘇聯，其次是英、美等國。「南進」主要是以日本海軍為主導的對外擴展戰略，其最終目標是在確保對中國大陸的霸權地位後，再向太平洋地區進行擴張，主要防衛對象是英、美等國，其次是蘇聯。北進與南進戰略間的調整過程，大體經歷了「南北並進」、積極北進又消極北進、伺機北進到積極南進等幾個演進階段；參閱李小白、周頌倫，〈日本北進、南進戰略演進過程述考〉，《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1期，2010年9月25日，〈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detail_2010_09/25/2618660_0.shtml〉（檢索日期：2013年1月20日）

10 1936年8月7日廣田弘毅內閣通過「基本國策綱要」（簡稱國策基準）。它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進而稱霸亞太地區的擴張方案，主要內容包括：

一、帝國鑑於內外的形勢，認為帝國當前應該確立的根本國策，在與外交和國防相互配合，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發展，基準的大綱如下：

(一)排除列強在東亞的霸道政策。

(二)充實所必要的國防軍備。

(三)對大陸政策的基本方針，在於希求滿洲國的健全發展，日滿國防的鞏固，消除北方蘇聯的威脅，同時

定」(簡稱防共協定,英文:Anti-Comintern Pact),形式上雖為對付第三國際為主要內容,但由於蘇聯為第三國際活動的根據地,實則將蘇聯定為假想敵狀態。因此,防共協定的簽訂,除意味著日本將對蘇聯採取更進一步的強硬政策,更意味蘇聯將處於日德兩國的雙面夾擊。

蘇聯為扭轉不利局面,先於1937年8月21日與國民政府簽訂「中蘇貸款協定與通商條約」¹¹,續於同年9月28日又與國民政府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大力援助中華民國對日抗戰。此後,蘇聯除援華物資大量向中國輸送,並給中國貸款,試圖把日軍拖滯在中國戰場,使其無力北進犯蘇,確保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利益。¹²因此,可以清楚的認

知,蘇聯支持蒙古獨立以及對中國的援助(貸款、軍事裝備及軍事顧問),實基於自身的安全利益考量。¹³換言之,日蘇兩國間的衝突,可謂在互信不足基礎上,加以中國東北利益掠奪不均的結果,而非日蘇任何一方意圖佔領對方。

對於上述兩種衝突背景分析,各有其合理論述基礎,亦能解釋及說明後續所發生的若干現象,因此兩者並無對錯與否的差別,反更能完整說明1939年日蘇諾門罕戰爭的背景。

參、戰爭衝突起因

日本關東軍發動諾門罕戰爭(英文: Battle of Nomonhan; 俄文: Бои на Халхин-

防範英、美,具體實現日、滿、華三國的密切合作,以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

(四)對南方海洋,特別是對外南洋方面,努力促進我國民族的經濟發展。

一面以漸進的和平手段擴張我國的勢力,並與滿洲國的建成相配合,力求國力的充實和加強。

二、以上述根本國策為軸心,統一調整內外各項政策,力求適應現在的形勢而實現刷新國政。其綱要如下:

(一)擴充國防軍備

1.陸軍軍備,以對抗蘇聯於遠東所能使用的兵力為目標,特別應充實在滿洲與朝鮮的兵力,使在開戰初期即能對其遠東兵力加以一擊。

2.海軍軍備,應配備和充實兵力,足以對抗美國海軍,確保西太平洋制海權。

(二)我國外交政策,總體來說,應以不折不扣地完成根本國策為基本精神。

三、政治行政機構的革新改善、財政經濟政策的確立以及其他各種設施的運用,都必須和上述根本國策相適應。

11 1937年8月21日,中蘇於互不侵犯條約簽後,另先後簽訂3次貸款協定,總金額約2億5千萬美元,用以購買蘇俄軍用物資:

一、第1次貸款協定簽訂於1937年11月,共5千萬美元。

二、第2次貸款協定簽訂於1938年7月,數額亦為5千萬美元。

三、第3次貸款協定簽訂於1939年7月,共計1億5千萬美元。

以上3次貸款協定,均載明中國政府以等值茶葉、羊毛、桐油等農產品,及錫、鎢、銻等礦產品,按期償還借款本利。上述貸款協定簽訂後,於我國抗戰初期的一部分武器如飛機、大砲等,即以信用貸款向蘇聯購得。1941年6月,德蘇戰爭爆發則完全停頓。

12 楊彥君,〈略論諾門罕戰爭前後蘇日遠東政策及其演變〉,《黑龍江史誌》,2006年10月,頁42。

13 學者李凡更進一步認為:日本方面挑起諾門罕事件的真正原因是為侵華戰爭需要,目的就是針對蘇聯方面的援華行為,對蘇聯採取以攻為守迫使其放棄援華政策。另外日本方面挑起諾門罕事件,也是為了造成更大的反蘇煙霧,以換取西方國家繼續對其侵華行經採取綏靖主義政策;參閱李凡,〈諾門罕事件爆發原因及對日蘇關係的影響〉,《歷史教學》,總第479期,2003年10期,頁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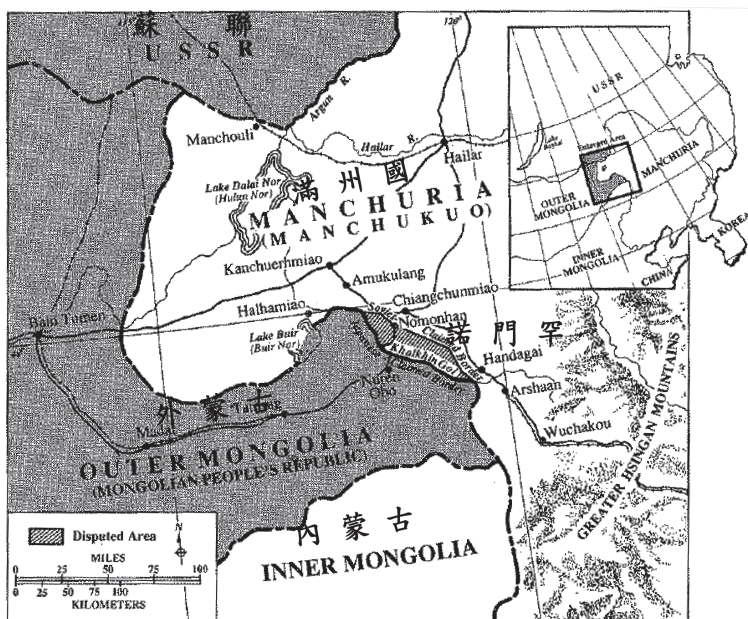


圖1 滿蒙邊界諾門罕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Christopher D. Bellamy and Joseph S. Lahanstein, "The New Soviet Defensive Policy: Khalkhin Gol 1939 As Case Study." U.S. Army War College, September 1990, p.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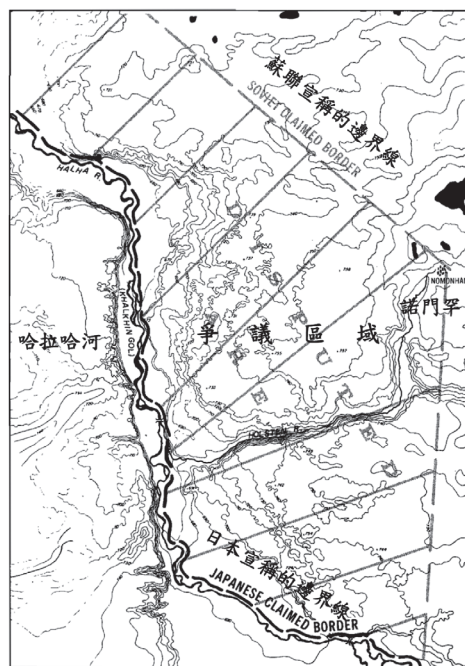


圖2 滿蒙邊界諾門罕爭議區域圖

資料來源：Edward J. Drea,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Fort Leavenworth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January 1981), p.3.

Голе; 日語：ノモンハン事件) 之前，一直主張國境線不是諾門罕，而是哈拉哈河（英文：Khalkh River/Khalkhin Gol），理所當然的認為哈拉哈河東岸不屬於蒙古國的領土，故以靠近東岸的諾門罕命名此次戰爭；而蒙古則認為此次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侵佔哈拉哈河兩岸的土地而發動的非正義戰爭，故以哈拉哈河命名此次戰役¹⁴（蘇聯稱「哈拉欣河戰役」或「哈勒欣河事件」與蒙古一致），日本則將此次戰爭稱為「諾門罕」或「諾門罕事件」（我國稱「諾門罕戰爭」與日本

用法一致）。此一爭議區域正位於哈拉哈河以東至諾門罕城鎮之間狹長的25公里區域內¹⁵（如圖1、圖2）。因此，不僅日本與俄蒙間對於此一地區的作戰各持己見，另對於此戰爭往後的影響各方觀點亦有所不同。

除了邊界不明確造成兩國軍事衝突外，另有學者從不同的研究發現，認為尚有其他因素存在，如日本學者Ariunsaikhan Mandakh認為，由於關東軍對「『滿』、蘇（俄）國境處理綱要」¹⁶(Principles for the Settlement of

14 李·蒙赫達賚，〈七十年前的硝煙—諾門罕戰場考察〉，《呼倫貝爾學院學報》，第17卷第4期，2009年8月，頁1。

15 同註7，頁20。

16 有關「『滿』、蘇國境處理綱要」為日本關東軍於「諾門罕事件」軍事行動引用之依據，其內容要點如下：

方針

一、關東軍防衛「滿州」之根本方針為「不侵犯亦不被侵犯」；在此前提下，對蘇軍（含外蒙軍）在「滿」、蘇聯境線上的非法行為應在周延的準備下徹底地予以嚴懲，並使我軍屈服，以摧毀並封殺其野心於

Soviet Manchurian Border Disputes)軍事行動授權的認知，亦是造成軍事衝突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若能更加明確詳細，而非以「原則」方式規範，或許可以避免軍事衝突。¹⁷另一位日本學者Hosokawa Gokou則從研究地圖，發現不同時期地圖的改變（從1658至1922年共區分4個時期地圖），尤其日蘇雙方在此一地區邊界的標示上的差異，亦是造成衝突的可能因素。¹⁸

據上，學者專家間雖對於究竟是什麼因素，引發日蘇間的軍事衝突有不同見解，不論從主觀上認知差異，到客觀事件處理上的躁進作為，均與邊界因素有所相關聯。因此，可以確定邊界問題的確是造成日蘇衝突的起因，而非目的。換言之，兩國意圖於國境未確定地區擴大勢力，才是造成衝突事件不斷的起因。表象所見雖為日蘇兩軍在國境上形成對峙之勢，然問題焦點，則是兩國的利益衝突，衝突的型態亦從向外交、情報及軍事等各層面擴展升級。

肆、作戰概要

1939年5至9月日蘇於蒙古諾門罕地區發生激烈的軍事衝突，依日軍大本營陸軍部綜合「諾門罕事件經過概要」，區分第一次諾門罕事件及第二次諾門罕事件；第一次事件，由擔任西北防衛司令官的小松原中將遵照邊境處理綱要，主動向駐紮在貝加爾湖東南、哈拉哈河以東20公里的蒙古邊防軍發動攻擊，第二次事件則由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下令，渡過哈拉哈河，向蘇蒙軍主動發動攻勢。¹⁹相對於蘇軍，第一次諾門罕期間指揮官為布留赫爾（英文：Vasily Konstantinovich Blyukher，俄文：Васил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Блюхер），第二次諾門罕則由朱可夫（英文：Georgi Konstantinovich Zhukov，俄文：Георг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Жуков）擔任指揮官（如表2）。

一、雙方兵力編組

為從事此次戰爭，日蘇雙方均曾積極的

初期萌動之時。

要領

二、對蘇軍之非法行為，只有斷然地予以嚴懲，始能防止事件之頻發及其擴大之道理。

三、若遇蘇軍越境入侵時，在周延的計畫準備下，派遣足夠之兵力急襲殲滅之。

四、對於國境線不明確之處，萬一雙方起衝突時，不管兵力之多寡及國境界線如何，只求勝利不許失敗。

五、斥候與巡察等務必以軍官所指揮之有力部隊擔任之。

六、如發生事件時，應迅作報告和通報外，對於爾後之處理經過，亦應適時作報告與通報。

七、萬一惹起紛爭時，基於任務需要，宜斷然採取積極果敢的行動；至於有關其所生之枝節，應信賴上級司令部之處理，部隊本身則大膽放心專注於第一線之現有狀況以期必勝即可。

八、原有之指示、通牒等，自即日起一切作廢。

同註1，頁592-593。

17 Ariunsaikhan Mandakh, "The Background of the Khalkhin Gol Battle Outbreak," *The Battle of Khalkhin Gol (Nomonkhan Incident) in the World History-Knowing the Past and Talking of the Future* (Mongolia: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2009), p.28.

18 Hosokawa Gokou, "Many Changes and the Realities about the Border Maps in and Around Hulun Buir," *The Battle of Khalkhin Gol (Nomonkhan Incident) in the World History-Knowing the Past and Talking of the Future* (Mongolia: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2009), p.29.

19 同註2，頁613。

向諾門罕地區增兵，8月初，日蘇雙方當面總兵力，蘇軍約57,000人，而日軍約30,000人（如表3、表4）。²⁰對攻勢發動者而言，相較之下，日軍兵力明顯不足。另就戰爭潛力言，日軍於滿州地區總兵力，相較蘇軍於遠東地

區總兵力，僅有蘇軍的一半，其中關鍵性戰力組成如坦克及飛機，亦只有蘇軍的1/10及1/5，戰力明顯劣勢（如表5）。

二、雙方人員傷損

諾門罕戰爭日蘇雙方均投入大量作戰兵力，然在激烈的交戰過程，雙方究竟死了多少人，依雙方公布的數據顯示，仍存在許多真實性的爭議。如1980年蘇聯稱傷亡共18,815人，日本則於70年代承認戰死在諾門罕的士兵為18,000人。²¹然據20世紀60年代日本靖國神社陣亡靈牌的統計，在這次戰鬥中日軍陣亡人數則為2萬多。另據1991年蘇聯

表2 1939年日蘇諾門罕戰爭基本資料表

區分	第一次諾門罕		第二次諾門罕	
時間	5月11日至31日		6月中旬至9月16日	
指揮官	日軍	蘇軍	日軍	蘇軍
	小松原	布留赫爾	植田謙吉	朱可夫
地區	哈拉哈河以東		哈拉哈河兩岸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表3 日軍第一、二次諾門罕兵力編組概要表

區分	第一次諾門罕	第二次諾門罕
	第23師團	第7師團
部隊編組	步兵聯隊 1. 聯隊本部（附設通信班） 2. 步兵大隊×3 大隊本部 步兵中隊×4—各中隊×3小隊—各小隊×4分隊 —輕機關槍×2擲彈筒×1步槍×1 3. 聯隊砲中隊×1 各中隊2小隊—41式75毫米火炮×4 4. 速射砲中隊×1 各中隊2小隊—94式37毫米速射砲×4	1. 第23師團為主 2. 增配屬部隊 ● 步兵第26聯隊一中隊×2—速射砲，聯隊砲 ● 汽車輜重中隊×1 ● 汽車聯隊×1 ● 電信第3聯隊中隊×1無線小隊×1
	搜索隊 1. 搜索本部 2. 中隊×2—騎馬×1重裝甲車×1	1. 安岡支隊 第1戰車團—戰車聯隊×2 2. 配屬部隊
	野砲兵聯隊 1. 聯隊本部（附設觀測班） 2. 大隊×3 大隊本部 中隊×3—各中隊—觀測車×1火炮×4彈藥車×6 （大隊所屬各末尾中係配置38式122毫米榴彈砲，其他為38式75毫米野砲）	● 步兵第28聯隊第2大隊 ● 第7師團醫務隊 ● 獨立野砲兵第1聯隊 ● 高射砲第12聯隊中隊×1 ● 牽引車中隊×1 ● 工兵第42聯隊 ● 獨立工兵第22聯隊之中隊×1 ● 汽車第3聯隊 ● 電信第3聯隊之無線小隊×1
	工兵聯隊 1. 聯隊本部 2. 中隊×2 3. 器材小隊×1	

20 Edward J. Drea,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Fort Leavenworth: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1981), p.9.

21 肖勇，〈迷霧重重的諾門罕之戰〉，《百戰經典》，2005年8月，頁51。

	輜重兵聯隊 1. 聯隊本部 2. 汽車中隊×2	各式武器 1. 步兵大隊×13（其中3個大隊隸屬第23師團） ● 反戰車火炮×76門 ● 野砲×12門 ● 90式野砲×8門 2. 戰車連隊×2-70餘輛 3. 工兵中隊×5（其中1個中隊隸屬第23師團） 4. 高射砲連隊×1 5. 各型車輛×400餘輛 6. 第2飛行集團各式飛機×180餘架 ● 偵察機×18 ● 戰鬥機×96 ● 輕轟炸機×12 ● 重轟炸機×54
	師團通信隊 1. 通信隊本部 2. 有線電小隊×2 3. 無線電小隊×1	

資料來源：方志祿譯，《九一八事變與關東軍—關東軍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8年6月），頁612-613、649、656-658。

表4 蘇蒙軍第一、二次諾門罕兵力編組概要表

區分	第一次諾門罕	第二次諾門罕
部隊編組	外蒙騎兵第6師團 騎兵連×2 ● 騎兵中隊×4 ● 機關槍中隊×1—機關槍×12 ● 反戰車砲小隊×1—火炮×3	除第一次兵力編組，另增加： ● 戰車旅團×1 ● 裝甲車旅團×3 ● 機械化狙擊兵師團×1 ● 軍團重砲中隊×1 ● 飛機×100架以上
	蘇軍戰車第11旅團 機械化大隊×1 ● 裝甲車×7 ● 騎砲中隊×2—置砲×3，速砲×1 ● 獨立騎兵中隊×1	
	狙擊機關槍大隊 ● 搜索隊×1 ● 狙擊中隊×3 ● 反戰車砲中隊×1—砲×14 ● 高射機關砲小隊×1—砲×3 ● 裝甲車中隊×1 ● 牽引車中隊×1 ● 工兵中隊×1	
	增加狙擊第149連隊	

資料來源：方志祿譯，《九一八事變與關東軍—關東軍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8年6月），頁642-643、648。

解體後解密的檔案顯示，蘇軍真正死亡人數約7,000人，超過1,000人失蹤，另外約16,000餘人受傷。日滿死傷則高達54,000餘人，蘇

蒙死傷18,500餘人。²²

雙方確切的傷亡數據或許無法得知，但若依各自發布自身數據，合理推算日軍傷

22 陳輝，〈皇軍之花—凋謝在中華草原—五萬關東軍兵敗諾門罕記實（上）〉，《法律與生活》，1995年第9期，頁1。

表5 1931-1939日蘇兵力變化對照表

年份	蘇軍遠東地區兵力				日軍滿州地區兵力			
	兵力	步兵師	飛行器	坦克	兵力	步兵師	飛行器	坦克
1931	？	6	？	？	65,000	1	？	？
1932	100,000	7	160	250	94,000	4	100	50
1933	？	8	300	300	114,000	3	130	100
1934	230,000	11	500	650	144,000	3	130	120
1935	240,000	14	950	850	164,000	3	220	150
1936	300,000	16	1,200	1,200	194,000	3	230	150
1937	370,000	20	1,560	1,500	200,000	5	250	150
1938	450,000	24	2,000	1,900	220,000	7	340	170
1939	570,000	30	2,500	2,200	270,000	9	560	200

資料來源：Stuart D. Goldman, *Nomonhan, 1939: the Red Army victory that shaped World War II* (Maryland: U.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2), p. 20.

亡大約是蘇軍的2至3倍。因此，從1937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間日軍的戰死和傷殘（無法重返戰場）人數比較，1937年，5.1萬人；1938年，8.9萬人；1939年，8.2萬人；1940年，4.2萬人；1941年，4.1萬人。這段時間，日本陸軍的總兵力約70萬人，也就是平均每年要消耗掉陸軍10%兵力（約6萬），²³而諾門罕地區單一戰事，若以2萬人傷亡的保守計算，除主力第23師團戰力幾乎全失外（如表6），另此單一戰事的傷亡，已佔日軍1939年全年超過30%以上的戰損，實足以影響日本考量是否持續於此地與蘇聯作戰。

伍、作戰評析

有關日蘇兩軍於此次作戰之結果，雖多數專家均已認定是蘇軍獲勝，但對於何以獲勝，其有關因素究竟為何，本文試圖從軍事

戰略指導、情報與反情報、後勤能力、作戰理論發展以及軍事科技發展等要素，評析何以日軍戰敗而蘇軍能獲勝。

一、軍事戰略指導

1936年日本的「國策基準」產生「北進」與「南進」併行的軍事戰略。如此的領土兼併行動，改變日本作為島國的國家體質，成了兩棲國家。因此，在戰略上既必須防衛來自海洋的威脅（美國），也必須防衛來自陸地的威脅（俄羅斯與中國）。這意味著日本必須著手準備兩種異質的戰爭（海戰與陸戰），也意味著日本必須同時建設海軍與陸軍。日方同時追求各個戰略目標，如此異質性併存的戰略，將導致戰略錯亂，²⁴也助長軍種間對有限資源的競爭，以致各行其事的情況屢屢發生，戰略指導嚴重錯誤。

相較於蘇軍，1930年中期，雖曾同時

23 俞天任，〈日本錯判大戰局勢〉，《領導文萃》，2009年第12期，頁56-57。

24 同註3，頁23。

表6 諾門罕戰爭日軍傷亡統計表

區分	部隊	死	傷	失蹤	小計	病	合計
第一次諾門罕	第23師團	157	97	12	266	0	266
	汽車第1聯隊	2	22	0	24	0	24
合計		159	119	12	290	0	290
第二次諾門罕	第23師團	4,976	5,321	349	10,646	1,312	11,958
	第7師團	1,109	1,699	345	3,153	327	3,480
	第8國境守備隊	660	596	98	1,354	100	1,454
	第2師團	193	111	0	304	98	402
	第4師團	3	6	2	11	187	198
	砲兵隊	556	525	211	1,292	158	1,450
	獨立守備隊	109	143	12	264	27	291
	關東軍汽車部隊	32	40	0	72	0	72
	高射砲部隊	21	98	0	119	29	148
	防疫給水部	27	26	3	56	17	73
	第1師團	1	1	0	2	0	2
	其他部隊	33	97	1	131	78	209
合計		7,720	8,663	1,021	17,404	2,333	19,737
其他部隊	坦克第1旅團	69	67	7	143	0	143
	安岡支隊配屬部隊	21	102	2	125	0	125
	航空部隊	141	89	0	230	0	230
	獨立野砲第1聯隊	8	24	1	33	0	33
合計		239	282	10	531	0	531
總計		8,118	9,064	1,043	18,225	2,333	20,558

資料來源：阜應、王贊忠，《改變歷史的戰爭》（臺北：知兵堂出版，2007年），頁162。

採取兩面部署作戰(two-front war)政策，包括人民正面(The Popular Front)與聯合正面(The United Front)，除預防邊界地區的反蘇聯盟，並避免於無盟國的情況下與日本或德

國作戰。²⁵但1939年蘇日軍交戰之前，蘇聯為扭轉兩面作戰不利的戰略態勢局面，先於1937年8月21日與國民政府簽訂「中蘇貸款協定與通商條約」，續於同年9月28日又與

25 Stuart D. Goldman, "The Influence of Khalkhin Gol on the Outbreak, Conduct, and Outcome of World War II," *70Years Since the Nomonkhan Incident (Battle of Khalkhin Gol): Collection of Treatises in the 200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Ulaanbaatar* (Japan: Fukyosha Publishing Inc, 2010), p.74.

國民政府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大力援助中華民國對日抗戰。此後，蘇聯除援華物資大量向中國輸送，並給中國貸款，試圖把日軍拖滯在中國戰場，使其無力北進犯蘇，確保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利益。尤其次年8月23日與德蘇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²⁶ (The 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迫使日本不得不考量當前困境。對於日本而言，蘇德的突然簽約不啻是一場外交突襲。²⁷如此的創機造勢作為，除可免除蘇聯兩面作戰的窘境，更可妨礙關東軍向諾門罕地區增兵。

二、情報與反情報

情報與反情報作戰是貫穿作戰全程，影響戰爭勝敗的關鍵，因此如何獲取情報及反情報，成為掌握敵軍而及不被敵人掌握的重點。

日本防衛研究所戰史教官小谷賢，2007年於開普敦參加第33屆國際軍事史學會(The 33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ilitary History, Cape Town, 2007)發表「1930年代日本情報與日蘇邊界衝突」(Japanese intelligence and the

Soviet-Japanese conflicts in the 1930s)一文指出，日軍成功透過收買及收編蘇聯人事從事情報分析，破解從1936至1939期間的軍事部署密碼及情資，包括張鼓峯及諾門罕期間的軍事部署。²⁸據此，在情報分析能力沒問題基礎上，何以日軍仍發生如此多的錯誤，實則與情報判斷密切相關，包括情報判斷上過度自信與輕視敵人（包括意圖、實力、戰法等），以及國際形勢分析上，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錯誤，這些錯誤對戰役進程與結果均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第一次諾門罕戰爭，日軍即因裝甲戰力不如蘇軍而失敗，然隨第一次諾門罕戰爭結束，蘇蒙軍即積極調整部署兵力於哈拉哈河兩岸，相較於日軍所擔心者，莫過於喪失攻擊時機，而非對於蘇軍實況掌握，並加強軍事行動的準備與整備，兩相較之下呈現極大的落差。至於第二次諾門罕戰爭，日軍則判斷認為時機已到，主要認為在雨季到來之前還有兩個月，加以對蘇蒙軍「大清洗」²⁹（又稱大整肅或清黨審判，英文：Great Purge，

26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條約內容要點如下：

- 條約締結雙方保證不單獨或聯合其他國家彼此間施用武力、侵犯或攻擊行為。
- 締約一方如與第三國交戰，另一締約國不得給予第三國任何支持。
- 締約雙方決不參加任何直接、間接反對另一締約國的任何國家集團。
- 條約有效期為10年。

參閱〈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27 羅衛萍，〈試析諾門罕戰役中日本的情報分析失誤〉，《軍事歷史》，2012年第3期，頁46。

28 小谷賢，“Japanese intelligence and the Soviet-Japanese border conflicts in the 1930s,” *The 33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ilitary History* (Cape Town: 2007), pp.131-137.

29 意指蘇聯在1930年代的肅反運動，是一場政治鎮壓和迫害的運動。大清洗的背景是史達林和政治局希望消滅任何反對政府的專制統治的源泉，包括對蘇聯共產黨內部的清洗以及對無辜人員的迫害，這段時期典型的現象包括無處不在的政治審查、到處都存在的懷疑「間諜破壞」、做秀公審、關押和死刑；參閱〈蘇聯肅反運動〉，《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8%85%E6%B4%97>>（檢索日期2013年1月20日）。因此，從1937至1938年俄軍內務部開始「大清洗」，肅反了大批軍隊中優秀幹部。1938年6月13日，蘇聯遠東地區內務人民委員留希科夫大將向日本關東軍投降，並告訴日本人，史達林為了清除異己，在蘇聯大搞肅反運動，此後一年間，共有3.5萬名軍官被鎮壓，其中包括高級軍官的80%，元帥的3/5，

俄文：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 對軍事作戰指揮能力影響的判斷，認為已經整肅的部分軍事指揮官，包括在張鼓峯戰鬥中指揮蘇軍打敗日軍的布留赫爾元帥都被處決，因此蘇蒙軍的戰鬥力會大大的減弱。³⁰復加對蘇軍援蒙的決心及作戰主力始終未能確實掌握，並自認為兵力超過蘇蒙軍約3倍。³¹然事實上，至8月初，雙方總兵力蘇軍約57,000人，而日軍則僅約30,000人。³²如此劣勢情況，日軍倉促發起戰事，除難以創造決定性戰果，後續再以增援兵力投入，亦犯下逐次用兵之大忌。

因此，先入為主的不客觀，加以日軍自「甲午戰爭」以來接連獲勝的自信與輕敵，除錯估蘇軍的實力，更誤判了蘇聯捍衛戰略利益及安全的意圖，成為日軍用兵失利的關鍵。諸如此類情況還包括，狂妄地宣稱日軍一個師團可以對付蘇軍3個師。當時日軍整個

處在一種病態的亢奮中，蠢蠢欲動。³³日軍試圖「以寡擊眾」的情形，除過分自信外，更完全違反一般戰術原則；攻者必須超過對方3倍以上兵力。³⁴甚至主觀的認定蘇軍與日軍在師團級部隊的戰力比約0.8：1。³⁵然就實際的戰力比，日軍與蘇軍實存在極大的戰力落差（如表7）。

在反情報作為上，蘇聯除積極透過間諜席格爾（Richard Sorge；因將日本對蘇的政策情報透露給蘇俄諜報機關爆發「席格爾事件」），獲悉日本的企圖。³⁶通過打入東京高層的“拉姆紮³⁷”小組等情報管道，早已獲悉日本的「帝國國防方針」（日文：ていこくこくぼうほうしん）、對蘇「8號作戰計畫」³⁸等重要戰略計畫。另蘇軍指揮官朱可夫為達出奇制勝的效果，極力隱瞞進攻意圖；透過大量偽裝、欺騙及戰術佯動，加以徹底的保

涉及所有的軍區司令和絕大部分集團軍司令；參閱何立波，〈諾門罕之戰—關東軍為何慘敗於蘇軍〉，《往事歷歷》，2012年第8期，頁41。

30 姜東平，〈走進諾門罕〉，《文史精華》，總116期，2000年1月，頁29。

31 同註7，頁24。

32 同註20。

33 楊大衛，〈諾門罕戰爭：日本第一次慘敗〉，《炎黃春秋》，2005年第8期，頁24。

34 關東軍估計當時蘇軍兵力為：以軍團砲兵所增強之狙擊師團1個左右（狙擊步兵約9個大隊，砲約20-30門）、戰車旅團2個（約150-200輛）、飛行部隊2-3個旅團（約150架）以及汽車1,000輛以上。外蒙軍方面估計為騎兵2個旅團。據此，依日軍「機密作戰日誌」記載：「當時認為，派遣第2飛行集團、第23師團以及安岡支隊等猶如殺雞用牛刀那般過分誇張，並基於第一次事件的經過情形以及第二次事件當初敵人之兵力加以研判，相信以吾方之此等兵力足可解決本事件。」同註1，頁658、711。

35 同註31。

36 對於日本軍事力量的使用，是否會發展成全面性戰爭？蘇聯透過於日本從事諜報工作人員席格爾所提供之消息及日本當時新聞報導，對於日本政府將採取不擴大方針政策早已有所掌握，同時對於日軍的作戰腹案和兵力使用等，蘇聯亦以各種手段，特別在戰場上採以軍事搜索，已大致獲知日軍的動態；同註1，頁590。

37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個叫作拉姆紮的諜報小組在東京秘密活動，它由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等9個國家30餘名情報人員組成，主要任務為刺探德、日等法西斯軸心國的戰略核心秘密；以席爾格為首。

38 「8號作戰計畫」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策劃對蘇開戰的計畫；計畫於1943年對蘇開戰，認定勝負關鍵在於決戰方向的選擇，因此擬定甲、乙兩案，甲案，關東軍將在中國東北部和東部同時發起進攻，以殲滅當面蘇軍。但進一步考慮地形和補給等因素後，日本人又制定了乙案，把決戰方向改在西部國境，即蘇聯的外貝加爾和外蒙古方向。

表7 日蘇兩軍主力概要對照表

部隊 \ 武器		自動 步槍	輕 機 關 槍	擲 彈 槍	機 關 槍	高射 機關 槍	速 射 砲	聯 隊 砲	迫 擊 砲	輕 砲	高 射 砲	15 榴 砲
蘇軍	狙擊師團×1	522	366	522	176	72	85	18	18	46	6	16
	戰車旅團×1		165		35		70			50		
	合計	522	531	522	211	72	155	18	18	96	6	16
日軍	長谷支隊		32	32	35		7	4	4	8		
	梶川支隊		12	22	4		4	4				
	合計		44	44	39		11	8	4	8		
戰力比（日軍爲1）			14.1	11.9	7.3		14.1	7.7				
備 考		1. 支隊正面之蘇軍狙擊師團係以缺一個連隊之師團以及右鄰師團之約1/3兵力來犯而估計約1個狙擊師團和1個戰車旅。 2. 支隊之輕機關槍和擲彈筒之數字，其一部爲估計。 3. 對長谷部支隊而言，不得不考慮對岸蘇軍砲兵之主火力。 4. 長谷部支隊之輕砲乃爲支援砲兵部隊。										

資料來源：方志祿譯，〈九一八事變與關東軍—關東軍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8年6月），頁935。

密及反情報作為，自7月起，開始利用鐵路和公路運輸，日夜不停地向哈拉哈河搶運戰略物資，然日軍卻誤以為蘇軍是在為過冬做準備並準備固守；假裝構築工事，並散布防禦設施和過冬的假情報。因此，直至1939年8月20日蘇軍發動總攻擊時，日軍仍未能察覺蘇軍積極調整部署意圖。³⁹當兵力調整、後勤補給及其他一切必須完成，對朱可夫言即已完成陷阱設置。⁴⁰但對日軍而言，整個諾門罕戰場上“看不出蘇軍有發動反攻的跡象”，主觀地認為，蘇軍不可能在8月份從西

部沙漠地帶發動進攻，因為當前的任務是做好過冬準備，以備明年開春再戰。因此，當蘇軍開始反攻時，包括第6軍司令荻洲立兵在內，日軍前線各部隊約半數軍官都在海拉爾休假，防禦設施也只完成了1/3（原計畫於11月完成）。⁴¹因此，蘇軍的總攻擊，除在精神上對日軍造成極大的震撼，更對心理平衡產生嚴重影響，尤其對以突襲、偷襲為善長的日軍而言，更是一次致命的打擊。

另戰爭期間，對國際形勢缺乏深入分析和動態把握，亦是造成日本在戰略運用上無

39 日軍於第二次諾門罕地面作戰期間，由於俄蒙軍對右岸陣地逐步強化，影響日軍在地面情報之搜索，故始終難以掌握哈拉哈河左岸俄軍狀況，誤將俄軍局部逆行，誤判斷為逐次後退之徵候。造成日軍自渡過哈拉哈河後，即遭遇強大火力反擊及人員重大的傷亡。因此師團長小松原雖已獲悉兩岸狀況，但對俄軍企圖的判斷，始終陷於局部現象的迷思與主觀成見，誤判俄軍即將撤退，加以無後續偵察確認情報之作為，影響作戰計畫擬定之適切與可行性。同註1，頁685-687。

40 同註7，頁27。

41 同註27，頁44。

法發揮的重要原因。加以1930年代由於日本過度專注於遠東地區，尤其是中國大陸，因此造成政治決策者與西方夥伴間，對已知事物急迫感溝通上產生困難，加以對中蘇關係間實情的不了解，進一步被扭曲為對中日關係的理解。⁴²

三、後勤能力限制

就後勤運輸能力言，日軍的後勤補給是靠畜力和大板車，而蘇軍用的是卡車，在運輸能量上遠高於日軍。朱可夫接任第57特別軍軍長後，立即動用所有機動車輛（包括火炮牽引車）緊急運送軍用物資，在短短10天內籌集了足以支撐全軍半個月以上的物資，使諾門罕地區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改變。8月發動大反攻前，為滿足作戰需要，蘇軍搶鋪設至蒙古的鐵路，緊急向前線運送了砲彈、燃油、食品等共6萬噸戰略物資。⁴³另蒙古亦於1939年7月間實施暫時法，編組百姓義務運輸軍需物資，據統計，運輸計超過455,000車次。⁴⁴因此，戰鬥中，蘇軍砲兵得以始終保持比日軍砲彈多3-5倍，而強大的砲兵火力對日軍人員和士氣殺傷極大。⁴⁵

相較於日軍，由於當時日軍的主要戰場

是在中國內地，關東軍能調用的砲彈儲備量嚴重不足，雖然將所屬的第3重砲旅團、野戰重砲第1聯隊、穆陵重砲聯隊與獨立重砲第7聯隊等全部搬到諾門罕戰場，但據估計砲彈僅有：105公厘加農砲砲彈4,800枚、150公厘加農砲砲彈900枚、150公厘榴彈砲砲彈4,000枚，如此少量的砲彈儲備，竟然佔全軍砲彈總量70%以上，大致上僅足夠每座火炮約2天的射擊需求。砲彈數量短少成了關東軍作戰的致命傷。⁴⁶尤其砲兵戰期間，日軍全天可發射砲彈約1萬枚，而蘇軍可發射約3萬枚，朱可夫還剩20萬餘枚砲彈，而日軍則已消耗了2/3砲彈，⁴⁷7月底，日軍每門中型火炮每日可分配到的砲彈數，更僅剩2-3發。⁴⁸據此，在後勤能力的競賽中，日軍已經先敗了。

作戰首重後勤是所有軍事專業人員的常識。然日軍不僅嚴重低估了蘇軍現代化的戰力優勢，還忽視了雙方在後勤補給能力上的差距。

四、作戰理論發展

諾門罕戰爭的結果，不僅證實了蘇軍在砲兵火力與坦克機動和裝甲防護力上，均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同時，日軍亦深刻認識到

42 同註5，頁1。

43 同註27，頁44-45。

44 S. Ganbold, "Strengthening the Defense Capability of Mongolia During the Khalkhin Gol War," *The Battle of Khalkhin Gol (Nomonkhan Incident) in the World History-Knowing the Past and Talking of the Future* (Mongolia: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2009), p.41.

45 蘇軍大量集結和前運作戰物資，總計1.9萬噸砲彈、6,500噸航空炸彈、燃油2.3萬噸、食品和其他物資9,000噸，共6萬噸。鐵路線向前伸350公里，使用汽車和油槽車約6,000輛。然而同期的日軍，則僅運送了1,500噸物資共使用500輛卡車。同註21，頁50-51。

46 林煒舒，〈改變戰略方向—諾門罕決定性會戰〉，《全球防衛雜誌》，254期，2005年10月，〈<http://www.diic.com.tw/mag/mag254/254-98.htm>〉（檢索日期：2013年1月20日）

47 同註21，頁51。小松原師團長對於砲戰提出之彈藥需求為10個基數，且須1次補充所需彈藥量，但上級並未能支援所需反令其：「因準備彈藥關係，希不必等至殲滅殘敵，應先行築城為要。」

48 同註7，頁26。

自己實力與蘇軍相差甚遠，從坦克數量到性能，從火砲性能到後勤能量，從戰場兵種協同作戰，到作戰理論發展都遠不及蘇軍。⁴⁹以下就作戰理論及軍事科技發展，分析兩軍在發展上的差異：

(一)蘇軍縱深作戰

縱深作戰理論由圖哈契夫斯基⁵⁰（俄文：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хачевский，英文：Mikhayl Nikolayevich Tukhachevsky，曾任蘇聯紅軍總參謀長、蘇聯元帥，生於1893年2月16日卒於1937年6月11日）所奠基，原則上是「穿插戰術」⁵¹（英文：Inserting Tactic）的擴大運用，係德軍「突擊群戰術」（德文：die Stostrupps Taktik）的衍生版。

1930年代中期蘇聯紅軍提出「縱深作戰與縱深作戰戰略理論」（deep operation and theory on deep battle strategy），⁵²朱可夫將軍即在諾門罕戰爭中，首次運用此一戰法擊敗日軍，並運用於爾後對德軍的衛國戰爭中。

大縱深作戰強調，未來的作戰是在

遼闊的空間與時間機動模式，因此必須揚棄與敵軍逐次爭奪陣地的傳統戰法，採取對敵防禦全縱深同時實施打擊的新戰法。在作戰上，以強大殺傷力的武器，同時壓制敵方防禦、多維縱深，在戰略方向上突破戰術的地幅，然後將主力部隊投入決戰，並以空降兵進行敵後突擊，迅速達成作戰成功；大縱深作戰是由突擊集團軍實施穿插作戰，突擊集團軍的進攻地域寬約50～80公里，作戰縱深則達到70～100公里⁵³（如圖3）。

因此，平坦開闊的蒙古草原，正有利此一戰術理論的運用，除使蘇軍坦克部隊戰力得以發揮，作戰理論本身亦得以於實戰場上獲得驗證；蘇軍第57特別軍擴編成第1集團軍，由朱可夫擔任司令官，下轄戰車11旅、摩托化裝甲7旅等陸軍部隊與砲兵、空軍的協同作戰經驗，讓裝甲車成為真正「快速作戰行動的決定性武器」。⁵⁴

(二)日軍近迫作戰

1933年的關東軍對於蘇軍的認識仍然

49 申文勇，〈諾門罕事件對日本南進北進政策的影響〉，《唐山師範學院學報》，第30卷第6期，2008年11月，頁111。

50 參閱〈圖哈契夫斯基〉，《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93%88%E4%BC%8A%E7%88%BE%C2%B7%E5%B0%BC%E5%8F%A4%E6%8B%89%E8%80%B6%E7%B6%AD%E5%A5%87%C2%B7%E5%9C%96%E5%93%88%E5%88%87%E5%A4%AB%E6%96%AF%E5%9F%BA>>（檢索日期：2013年1月20日）

51 所謂的穿插作戰(inserting operation)乃利用敵人部署間隙或薄弱部位插入縱深或後方的作戰行動，其目的是奪佔敵方縱深內的要點，襲擊、摧毀敵重要目標，分割、打亂其部署，斷敵退路，以分割、包圍、殲滅敵軍。同註46。

52 B. Shagdar, "The Battle of Khalkhyn Gol-in Military Art," 70Years Since the Nomonkhan Incident (Battle of Khalkhyn Gol): Collection of Treatises in the 200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Ulaanbaatar (Japan: Fukyosha Publishing Inc, 2010), p.170.

53 蘇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略思想家特里安達菲洛夫(V. K. Triandafillov)經檢討一戰缺失後，提出在進攻作戰中將大部分的兵力武器用於主要方向上，對敵軍形成壓倒優勢。另一位戰略家圖哈契夫斯基元帥，則為大縱深作戰理論奠定堅固的基石。他認為現代化的作戰條件下，不可能經過一次主力會戰就消滅敵人的軍隊，只有運用一連串的作戰才能達成戰爭的目的，他的戰爭思想對蘇軍影響極為深遠。同註46。

54 同註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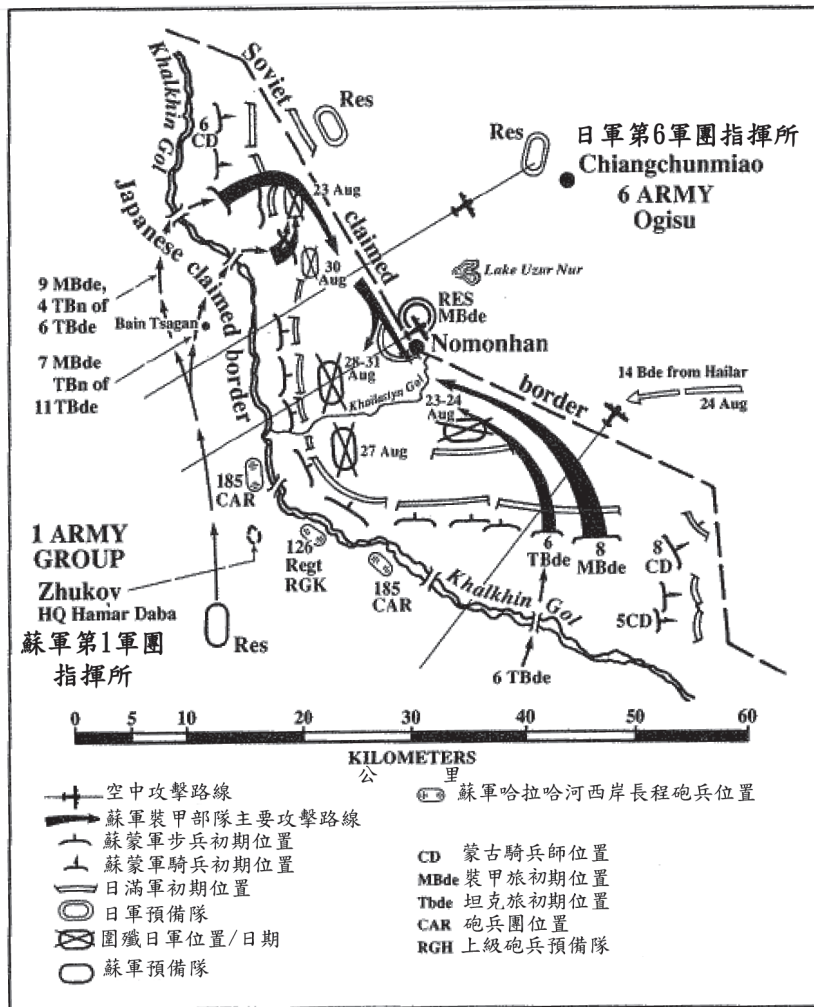


圖3 1939年8月20-31日哈拉哈河日俄作戰經過圖

資料來源：Christopher D. Bellarmy and Joseph S. Lahanstein, "The New Soviet Defensive Policy: Khalkhin Gol 1939 As Case Study," U.S. Army War College, September 1990, p.23.

停留在盲目服從以及戰場抗壓不足很快就投降刻板印象。⁵⁵另在戰術思想上，還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壕溝戰的影響，與法國人一樣，沒有意識到裝甲部隊的出現，即將對戰爭引起劃時代劇變。⁵⁶因此，戰術思想

落伍是關東軍的另一致命傷。

由於日軍於第一次諾門罕戰爭結束，並未認真檢討及研究蘇聯紅軍作戰方式的改變，因此對於「火力的本質」及「統一優勢的步、砲、戰等戰力要領」，並未從中獲取經驗與教訓，如此亦直接導致第二次諾門罕戰爭日軍的慘烈損失。⁵⁷日本原玉川大學教授若泰雄在「日本的戰爭責任」一書中對「張鼓峯事件」的分析：雖然這次戰役時間不長，但日本軍隊進行了從未經歷過的步兵、砲兵和坦克的聯合作戰，受到了猛烈砲火的襲擊，親身受到了什麼是現代戰爭的實際教育。在十多天的戰鬥中，軍隊有7,000餘人參戰，其中死傷率達22.3%，擔當正面防守的步兵第75團的死傷率達51.3%。然而，日本陸軍幾乎未從此次戰鬥中吸取教訓所以才導致了第二年滿蒙邊境的諾門罕事件的慘敗。⁵⁸從日蘇歷次軍事衝突，日軍不斷升高的傷亡率（如表8

），尤其是步兵，亦證實了日軍在作戰理論及軍事科技落後於戰場上的代價。

事實上，1938年7月日蘇雙方在「張鼓峯事件」發生時，蘇軍除已完成軍制的改革，近代化的軍隊建設，戰力更已大幅提

55 同註20，頁30-31。

56 同註46。

57 同註1，頁581。

58 孫叔林，〈日本軍國主義興亡與對俄（蘇）戰爭〉，《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2005年第4期，頁128。

表8 日軍參戰部隊傷亡率統計表

區 分	日俄戰爭 (1904-1905)	張鼓峯事件 (1938)	諾門罕戰爭 (1939)
步 兵	14.4%	24.7%	70.6%
騎 兵	1.7%	10.7%	51.2%
砲 兵	4.1%	7.7%	65%
工 兵	0.2%	14.7%	50%
運 輸 兵	0.2%	0%	25.4%
防 疫 兵	1.8%	12.6%	33.7%

資料來源：阜應、王贊忠，《改變歷史的戰爭》（臺北：知兵堂出版，2007年），頁159。

升。除對日軍夜襲作戰認真研究檢討，並研究出防禦戰鬥的對策，即於車載探照燈及大量照明彈下，暴露日軍於戰場上的行動，使日軍成為極易標定的目標。⁵⁹此一破解之法，亦直接造成日後於諾門罕戰爭中，當日軍再施以夜襲作戰而未能達預期效果為證。

五、軍事科技發展

由於日軍在火炮及坦克性能與蘇軍的嚴重落差，加以空中優勢無法持續有效支援，常造成軍事行動陷於被動，除影響作戰任務遂行，更造成作戰人員大量傷亡；因未擁有足以壓制蘇軍的火力，結果只有依賴步兵採取夜襲方式，獲取局部性及暫時性的勝利。⁶⁰然實際的落差究竟如何，分析如下：

(一)砲兵

作戰初期（7月），雖日軍植田司令官已發覺第23師團之砲兵力量極為脆弱，但

在無力改變火炮性能限制下，雖試圖以步兵夜襲進佔俄軍陣地，同時推進砲兵陣地以對哈拉哈河左岸俄軍砲兵實施制壓，但因夜間戰果無法確保，嚴重影響日軍砲兵火力有效支援作戰。⁶¹

依據當時日蘇兩軍在砲兵能力的比較（如表9），兩軍砲兵在射擊能力上亦存有差距，嚴重影響日軍作戰意圖的實現及戰場上作戰進展的推進。尤以第二次的諾門罕戰爭，日軍除未能集中優勢兵戰力，加以無法對哈拉哈河左岸蘇軍砲兵有效制壓，不僅重覆第一次諾門罕同樣錯誤，所造成的傷亡亦更加慘重。

(二)坦克

坦克性能的差異，成為諾門罕戰爭地面作戰勝敗關鍵。第一次諾門罕，日軍第一坦克團支援坦克計有182輛（該團總坦克總數為282輛，裝甲車31輛，為當時關東軍最精銳機動部隊），裝甲車51輛。蘇軍第6、11坦克旅，計坦克150輛、裝甲車154輛。⁶²第二次諾門罕，不僅數量上亦顯不足，性能亦遜於蘇軍，嚴重影響攻勢進展；數量上，日軍第1坦克師團，89式中輕型坦克87輛、裝甲車37輛、然蘇軍坦克數量T-28計80輛、T-130火焰噴射坦克12輛、各式裝甲車300餘輛。在性能上相較於日軍，蘇軍坦克噸位大、裝甲厚、行動半徑大、火炮射程亦較遠（如表10）。⁶³另缺乏反坦克武器，亦是造成日軍無法有效

59 同註1，頁579。

60 日軍擔任攻擊的步兵部隊，藉反覆實施夜襲，或從其間隙衝進俄軍陣地，奪佔俄軍部分陣地。但通常到次日，從四周以及左岸臺地上的重武器及火炮向日軍隊猛射，於是日軍主力不得再退回行動前的位置。同註1，頁729。

61 同註1，頁758-760。

62 同註22，頁22-23。

63 同註22，頁28。

表9 日蘇諾門罕戰爭期間火炮性能諸元概要對照表

日軍	砲種	38式A	38式12H	90式A	96式15H	92式10K	89式15K	41式	94式
	最大射程 (公尺)	榴彈 8,350 榴霰彈 5,800	5,650	14,000	11,900	18,200	18,100	7,100	8,300
蘇軍	砲種	76A	76BA	122H	152H	203H	107K	122K	150K
	最大射程 (公尺)	9,300	10,700	11,800	17,000	18,000	17,500	20,800	30,000
備考		A表示野砲、BA表示山砲、H表示榴彈砲、K表示加農砲							

資料來源：方志祿譯，《九一八事變與關東軍—關東軍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8年6月)，頁769-770。

表10 1939年日蘇主戰坦克性能比較表

項次	蘇軍T-28坦克	日軍89式坦克
研發時間	1931年	1929年
總重	28公噸	11.8噸
全長	7.44公尺	5.75公尺
寬度	2.87公尺	2.18公尺
全高	2.82公尺	2.56公尺
操作人數	6人	4人(車長、砲手、機槍手和駕駛)
裝甲厚度	30公釐鋼板	裝甲是用鉚釘固定的鎳鉻鋼板
主要武器	76.2公釐砲(70發)	57毫米砲(100發)
次要武器	7.62公釐機槍(8,000發)	6.5公釐機槍兩挺(子彈2,750發)
最大行程	220公里	140公里
最大速度	37公里/時	25公里/小時

資料來源：參考〈T-28坦克〉及〈89式坦克〉，《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T-28%E5%9D%A6%E5%85%8B>>及<<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4%B9%9D%E5%BC%8F%E4%B8%AD%E6%88%B0%E8%BB%8A>>(檢索日期：2013年1月20日)

反制蘇聯坦克的原因之一。⁶⁴

(三)航空兵

諾門罕戰爭開戰初期，日軍因戰機性能及訓練有素，擁有空中優勢，但受限於後續科技發展及大陸軍主義影響，航空兵雖不足以成為戰場上決勝的關鍵戰力，但其成功的空中突襲作戰，仍是值得探討。

1939年6月27日關東軍航空兵襲擊蘇聯的塔木斯克等機場，這是亞洲空戰史上第一次大機群成功突襲敵方機場，戰術上達到了出奇制勝的效果。另因此次襲擊成功，除癱瘓蘇聯空軍，奪取制空權，更為地面部隊的攻擊創造條件。宣稱當日摧毀蘇軍飛機124架，戰後統計，蘇方總損失飛機400架，而日

⁶⁴ Charles Ottersted, "The Kwantung Army and the Nomonhan Incident: It's Impact o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search Project, U.S. Army War College, 2000), P.1.

本僅損失162架。⁶⁵

日機除97式戰機（盟軍代號「Nate」，編號為Ki-27）優於蘇機E-16（又稱I-16或伊-16）外（如表11），加以雙方均採單機作戰方式，在訓練明顯優於蘇軍情況下，創造擊落蘇機50架，僅1架迫降外，獲得首次空戰重大戰果。⁶⁶不過7月初，當蘇軍開始改變雙機進攻隊形及使用火箭彈時，制空權就不再屬於日軍了，並開始對日軍實施夜間轟炸。⁶⁷日軍由於缺乏夜間照明，根本無從實施夜間

防空射擊或戰機攔截。⁶⁸10日之後，又因蘇軍在砲兵陣地和渡河點配備了嚴密的防空火網，加以徹底的疏散、偽裝等防範措施，故日軍在攻擊力不足情況下，儘管攻擊部隊英勇行動，戰果卻不甚理想。⁶⁹

總體上而言，日軍無法突破蘇軍現代化陣地有三項要素，包括蘇軍總體空中、地面火力遠優於日軍，而且陣地之組織設備亦達極為強韌程度。日軍則因缺乏性能相對的坦克，加以航空部隊對地面之攻擊力及步兵

表11 1939年日蘇主戰飛機性能比較表

項次	蘇軍E-16戰機	日軍97式戰機
研發時間	1934年	1930年
空重	1,350公斤	1,110公斤
最大起飛重量	1,715公斤	1,790公斤
全長	6.1公尺	7.53公尺
翼展	9公尺	11.31公尺
全高	2.6公尺	3.25公尺
動力	578匹馬力	610匹馬力
航速	440km/hr	460km/hr
航程	810km	800km
主要武器	1. 作戰初期7.62mm機槍2挺。 2. 後期除機槍2挺外，還可掛100公斤炸彈和火箭發射架2具。	1. 7.7mm機槍2挺。 2. 4枚25公斤炸彈或2具133公升副油箱。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參考〈E-16戰機〉及〈97式戰機〉，《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A-16%E6%88%B0%E9%AC%A5%E6%A9%9F>〉及〈<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4%B8%83%E5%BC%8F%E6%88%B0%E9%AC%A5%E6%A9%9F>〉（檢索日期：2013年1月20日）

65 同註49，頁112。

66 自5月下旬當日蘇兩軍航空作戰開始至7月上旬，日軍常能壓制俄軍航空部隊。因此，7月奇襲，日軍藉改變空中偵察規律（26日之前完成對俄基地空偵後，27日直接發動攻擊），迷惑俄蒙軍的空中警覺，有效發揮奇襲目的，使俄軍位散白斯、塔木斯克及塔尼霍愛拉等地航空基地陷於混亂局面，並創造輝煌的空戰戰果；計俄軍損失小型機100架、中型機38架（重創×8中小創×30）、大型機3架，而日方攻擊塔木斯克只有4架飛機未返基地，攻擊散白斯更僅損失1架。同註1，頁671-672。

67 7月中旬後蘇軍航空兵戰力漸恢復，位於塔木斯克、馬他特、散白斯等基地，各型機計大型機15架、中型機11架、小型機140-150架。相對日軍於戰場上之航空兵計有偵察2個中隊（7架）、戰鬥8個中隊（81架）、輕轟炸4個中隊（29架）、重轟炸3個中隊（9架），在數量上已取得優勢。同註1，頁785。

68 同註1，頁785。

69 同註1，頁747。

本身應具備之重武器兵力亦極為薄弱，至於砲兵能力亦有所不足。⁷⁰凡此均在在顯示日軍在軍事作戰理論及軍事科技發展落後情況下，嚴重影響作戰勝敗的事實。

據上，亦可合理推論，日軍多在情報不明情況下，採取大膽而冒險的軍事行動，已嚴重違反孫子兵法「先為不可勝」與「廟算」的用兵之大忌。因此，就結果論，日軍因大量的人員傷亡及物資損耗，加以未達成任何預期戰略目標，可謂慘敗，甚至被日本陸軍省稱作「日本陸軍成軍以來首次慘敗」（另一說法：日本陸軍史上最大的一次敗仗）。

陸、諾門罕戰爭意義與影響

對於諾門罕戰爭究竟有何特殊的歷史意義，不同的學者專家依據戰爭起因、交戰過程與影響等層次評價，包括「一場陌生的戰爭」、「一場遺忘的有限戰爭」、「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格局的局部戰爭」、「蝴蝶效應」、「亞洲第一次坦克大戰」及「第一次陸空立體作戰」等等，雖然評價各有不同，但各自陳述反映部分的事實，則有助於了解諾門罕戰爭其完整的歷史意義與影響。

一、「一場陌生的戰爭」與「一場被遺忘的有限戰爭」

「一場陌生的戰爭(A Strange War)」與「一場被遺忘的有限戰爭(A Forgotten Limited War)」代表諾門罕戰爭在第二次大戰諸多重大會戰中，其重要與影響性相對較低的觀點，包括20世紀西方戰略大師如富勒、李德哈特等人的著作中，並未提及這場發生在蒙

古草原上的戰爭。

相較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他戰場上的作戰規模，除交戰國家有限、交戰時間相對較短，加以遠離人口稠密且未擴及其他地區，在當時並未獲得國際上太多的關注。因此，1939年7月20日紐約時報的社論，即以「一場陌生的戰爭」對於蘇聯紅軍和日本關東軍在蒙古草原上的這場苦鬥，以「（他們）在人們注意不到的世界角落裡發洩著憤怒」⁷¹形容，可見此戰爭於當時，除未受重視外，且所獲評價亦不高的認知。

二、「蝴蝶效應」與「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格局的局部戰爭」

「蝴蝶效應」(The Butterfly Effect)一詞，代表諾門罕戰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格局的重大影響。事實上，諾門罕戰爭並未預期會成為軸心國最終失敗的伏筆，因此「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格局的局部戰爭」一詞，更深刻的呈現諾門罕戰爭對改變世界格局的影響力。因此，諾門罕戰爭前後，日本和蘇聯都根據世界形勢的變化和國情制定了相應的政策，同時給歐洲及亞洲戰場帶來重大影響：

(一)歐洲戰場

就蘇聯言，1930年中期，蘇聯的政策是兩面部署作戰(two-front war)，包括人民正面(The Popular Front)與聯合正面(The United Front)，除預防邊界地區的反蘇聯盟，並避免於無盟國的情況下與日本或德國作戰。⁷²然而，諾門罕戰爭後，1941年4月13日「蘇日中立條約」（英文：Soviet-Japanese Neutrality Pact，日文：日ソ中立条約）⁷³簽定，除降低

70 同註1，頁784。

71 Edward J. Drea, "A Strange War", *New York Times*, 20 Jul 1939, p.8.

72 同註25，頁74。

73 條約內容共4條，附加1個聲明，有實質內容的是第一、二條，第一條規定，雙方維持和平友好關係，互相尊

日本方面的威脅，並得以將遠東地區部隊轉用於歐洲戰區，全力對抗西線的德軍攻勢，直接影響德蘇最後的勝敗；蘇聯從遠東地區抽調18個師、1,700輛坦克和1,500架飛機，確保了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⁷⁴因此，就德國言，當失去日本於亞洲地區牽制蘇軍的力量時，蘇聯得以調整兵力成功抵抗德國進攻，加以同盟國在歐洲的反攻作戰進展順利，軸心國在接續的戰敗中投降，影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格局。

(二)亞洲戰場

就日本言，1936年8月制定了「國策基準」（又稱基本國策綱要）；「北進」（北進論Northern Expansion Doctrine；陸軍向西伯利亞取攻勢的陸上戰略）與「南進」（南進論Southern Expansion Doctrine；海軍向南奪取東南亞資源的海洋戰略），併行的發展戰略，不僅拖垮日本的國力與政府財政，更激化日本對外侵略擷取更多資源的迫切感。⁷⁵尤其在企圖迅速滅亡中國政策失敗後，陷入中

國全面抗日戰爭的泥淖，又處於極其渴望獲取蘇聯在遠東地區的石油等重要戰略物資、侵略方針南進還是北進的矛盾當中，諾門罕戰爭正是在這種情勢下發生。加以「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迫使日本主動透過外交途徑停戰，改變原「北進」與「南進」併行戰略，改採穩住北方、全力南下的戰略方針，如此政策的重大調整，導致日本加速走向太平洋戰爭的失敗之路。

就中華民國而言，抗戰初期受惠於蘇軍的軍事援助，⁷⁶得以勉強抵抗日軍攻勢。尤其，日蘇諾門罕戰爭期間，適值日軍侵華「武漢保衛戰」的高峰期，因此諾門罕戰役除有效的牽制日本關東軍轉用兵力於華中地區，更為國軍持久戰略塑造有利的時空因素，間接造成日軍久戰未決，拖累作戰進展速度，改變原有戰略態勢。然而「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雖中止了蘇聯對中華民國的援助，但受惠於美國的參戰除改變了太平洋戰事發展，美援接替蘇援，除有利國軍持

重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第二條規定，“如果締約的一方成為第三者一國或幾國的戰爭對象時，締約另一方在整個衝突過程中將保守中立。”聲明說“蘇聯保證尊重滿州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從條約內容充分顯現日蘇兩國間的意圖；雖然蘇聯的意圖在於向日本保證，一旦日美開戰，蘇聯將保持中立，並以此換取一旦蘇德衝突時日本將保持中立。根據此一精神，蘇聯在已經發生的中日戰爭中，也必須保持中立。這樣，蘇聯在此之前對中國的一切援助，尤其是軍火和軍事人員的援助，都可視為“違反中立”精神，而往後的援助更失去了依據。然而對於正在對日抗戰的中國而言，則是政治上的一大打擊。因此，在條約簽訂後，除了助長日本侵略的野心，同時也增加中國抗戰的壓力，成為中國人民進入抗戰最困難時期的重要因素之；參閱《國際條約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頁303-304。

74 同註25，頁81。

75 同註3，頁23。

76 1939年6月，《中蘇通商條約》簽訂，此後蘇聯援華物資大量向中國輸送，並給中國大量貸款。1938年向中國提供了1億美元的貸款，1939年又提供了1.5億美元的貸款，並提供武器和裝備。1938年中，提供了297架飛機、82輛坦克、425門加農砲和榴彈砲、1,825挺機槍，還有其他彈藥、交通工具、燃料。蘇聯政府還拒絕日本政府要求蘇聯（從中國）召回軍事顧問和飛行員，停止向中國供應武器的外交照會；引註，基裡林，《國際關係和蘇聯對外政策史(1917-194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212；參閱王春良，〈論日、蘇張鼓峯事件和諾門罕事件〉，《聊城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頁41。

久戰略的實踐，亦逐漸改變戰場態勢往有利我的方向發展。因此，史學家稱，在一定程度上，諾門罕戰爭導致了日本從「北進」改為「南進」戰略，兩年後偷襲珍珠港、向美國宣戰和最後的戰敗，⁷⁷ 結束「大東亞共榮圈」，同時也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另戰後，我國雖獲得中國戰場上艱難的勝利，但蒙古卻於1942年2月「雅爾達密約」⁷⁸中被犧牲了，繼1945年8月14日被迫與蘇俄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接受該協定，承認外蒙古的獨立。因此，我國領土的改變，亦可謂受諾門罕戰爭後續影響所致。

三、「亞洲第一次坦克大戰」與「第一次陸空立體戰」

然就作戰型態言，諾門罕戰爭是一場以地面作戰為主，空中支援作戰為輔的作戰型態；地面作戰又以坦克及砲兵戰為勝敗之關鍵。其中尤以第二次諾門罕戰爭為代表，首先，大規模軍兵種聯合作戰，使用步兵、騎兵、砲兵、坦克和空軍作戰。其次，作戰全期，日蘇兩軍除大量使用坦克從事地面作戰，更以空中支援作戰及空襲，成就了此次作戰勝敗的關鍵與特色，創造了「亞洲第一次坦克大戰」。另蘇聯名將朱可夫除成功驗證「大縱深作戰理論」(deep operation and theory on deep battle strategy)，空、步、砲兵與裝甲部隊的協同作戰，更讓裝甲車能真正的成為

「快速作戰行動的決定性武器」⁷⁹，同時更實施了空降作戰，則成就了「第一次陸空立體戰」。

柒、結 語

「諾門罕戰爭」以其影響性，證明了在歷史上的定位與價值。但「戰爭迷霧」緣故，仍將使戰場成為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地方，很多的結果是無法預期，可能是預期的好，亦可能是難以想像的嚴重，「諾門罕戰爭」即具備這樣的特質。因此，儘管現代軍事科技及作戰理論的發展已大幅進步，戰場透明度亦已相對的清晰，但屬於各時代的作戰特色，打破傳統的「超限戰」作戰方式，尤其是作戰對象與手段的改變，如恐怖份子與網路作戰，此類的非對稱的作戰型態，將持續影響未來所發生的每一場戰爭，並創造其獨特的歷史價值。

收件：102年02月01日

修正：102年04月02日

接受：102年04月08日

77 韓偉林，〈那一場慘烈的戰事—諾門罕戰爭尋蹤〉，《烟雲》，2009年12月，頁94。

78 根據該協定規定，蘇聯承諾德國投降後2-3月內參加對日作戰，但其條件是蘇聯要獲得維持「蒙古人民共和國」現狀，收回1904年日俄戰爭後喪失的全部特權等。

79 Yaroslav Shulatov, "The Operative analysis of combat actions in Mongolia by Soviet Military Command (Based on G. Shtern's Report Regarding August 20-26 Operation)," *The Battle of Khalkhyn Gol (Nomonkhan Incident) in the World History-Knowing the Past and Talking of the Future* (Mongolia: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2009), p.39.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阜應，王贊忠，2007。《改變歷史的戰爭》。
臺北：知兵堂。
- 1961。《國際條約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識，1961年）。

專書譯著

- 方志祿譯，1988。《九一八事變與關東軍—關東軍作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期刊論文

- 王春良，2004/1。〈論日、蘇張鼓峯事件和諾門罕事件〉，《聊城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頁41。
- 申文勇，2008/11。〈諾門罕事件對日本南進北進政策的影響〉，《唐山師範學院學報》，第30卷第6期，頁111。
- 李凡，2003/10。〈諾門罕事件爆發原因及對日蘇關係的影響〉，《歷史教學》，總第479期，頁44。
- 李·蒙赫達賚，2009/8。〈七十年前的硝煙—諾門罕戰場考察〉，《呼倫貝爾學院學報》，第17卷第4期，頁1。
- 肖勇，2005/8。〈迷霧重重的諾門罕之戰〉，《百戰經典》，2005年第8期，頁50-51。
- 何立波，2012/8。〈諾門罕之戰—關東軍為何慘敗於蘇軍〉，《往事歷歷》，2012年第8期，頁41。
- 俞天任，2009/12。〈日本錯判大戰局勢〉，《領導文萃》，2009年第12期，頁56-57。

姜東平，2000/1。〈走進諾門罕〉，《文史精華》，總116期，頁29。

孫叔林，2005/4。〈日本軍國主義興亡與對俄（蘇）戰爭〉，《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2005年第4期，頁128。

陳輝，1995/9。〈皇軍之花一凋謝在中華草原—五萬關東軍兵敗諾門罕記實（上）〉，《法律與生活》，1995年第9期，頁1-23。

張錫模，2005/6。〈地理的威權—日俄戰爭的地緣政治〉，《當代》，第214期，頁21。

楊彥君，2006/10。〈略論諾門罕戰爭前後蘇日遠東政策及其演變〉，《黑龍江史誌》，2006年10月，頁42。

楊大衛，2005/8。〈諾門罕戰爭：日本第一次慘敗〉，《炎黃春秋》，2005年第8期，頁24。

羅衛萍，2012/3。〈試析諾門罕戰役中日本的情報分析失誤〉，《軍事歷史》，2012年第3期，頁46。

韓偉林，2009/12。〈那一場慘烈的戰事—諾門罕戰爭尋蹤〉，《烟雲》，2009年12月，頁94。

網際網路

- 申文勇，2010/9/25。〈諾門罕事件對日本南進北進政策的影響〉，《唐山師範學院學報》，<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detail_2010_09/25/2618652_0.shtml>。
- 李小白，周頌倫，2010/9/25。〈日本北進、

南進戰略演進過程述考》，《抗日戰爭研究》，<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detail_2010_09/25/2618660_0.shtml>.

自由的百科全書，2013/3/10。〈圖哈切夫斯基〉，《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93%88%E4%BC%8A%E7%88%BE%C2%B7%E5%B0%BC%E5%8F%A4%E6%8B%89%E8%80%B6%E7%B6%AD%E5%A5%87%C2%B7%E5%9C%96%E5%93%88%E5%88%87%E5%A4%AB%E6%96%AF%E5%9F%BA%>>>.

林煒舒，2005/10。〈改變戰略方向—諾門罕決定性會戰〉，《全球防衛雜誌》，第254期，<<http://www.diic.com.tw/mag/mag254/254-98.htm>>.

外文部分

專書

Edward J. Drea, 1981.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Fort Leavenworth: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Stuart D. Goldman, 2012. *Nomonhan, 1939: the Red Army victory that shaped World War II*. Maryland: U.S. Naval Institute Press.

專書論文

B. Shagdar, 2010. “The Battle of Khalkhin Gol-in Military Art,” *70Years Since the Nomonkhan Incident (Battle of Khalkhin Gol): Collection of Treatises in the 200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Ulaanbaatar*. Japan: Fukyosha Publishing Inc.p.170.

Stuart D. Goldman, 2010. “The Influence of Khalkhin Gol on the Outbreak, Conduct, and Outcome of World War II,” *70Years Since the Nomonkhan Incident (Battle of Khalkhin Gol): Collection of Treatises in the 200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Ulaanbaatar*. Japan: Fukyosha Publishing Inc.p.74.

期刊論文

Edward J. Drea., 1939/7. “A Strange War,” *New York Times*, Jul 1939, p. 8.

學位論文

Charles Ottersted, 2000. *The Kwantung Army and the Nomonhan Incident: It's Impact on National Security*. U.S. Army War College, USA.

Christopher D. Bellamy and Joseph S. Lahanstein, 1990. *The New Soviet Defensive Policy: Khalkhin Gol1939 As Case Study*. U.S. Army War College, USA.

研討會論文

Ariunsaikhan Mandakh, 2009. “The Background of the Khalkhin Gol Battle Outbreak,” The Battle of Khalkhin Gol (Nomonkhan Incident) in the World History-Knowing the Past and talking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2009, p.28.

Hosokawa Gokou, 2009. “Many Changes and the Realities about the Border Maps in and Around Hulun Buir,” The Battle of Khalkhin Gol (Nomonkhan Incident) in the World History-Knowing the Past and

talking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2009, p.29.

Paine S.C.M, 2004. “Russo-Chinese Myths and Their Impact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30s,” Hokkaido University Collection of Scholarly and Academic Papers, 2004, pp.1-6.

S. Ganbold, 2009. “Strengthening the Defense Capability of Mongolia During the Khalkhin Gol War,” The Battle of Khalkhyn Gol (Nomonkhan Incident) in the World History-Knowing the Past and talking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2009, p.41.

Yaroslav Shulatov, 2009. “The Operative analysis of combat actions in Mongolia by Soviet Military Command (Based on G. Shtern's Report Regarding August 20-26 Operation),” The Battle of Khalkhyn Gol (Nomonkhan Incident) in the World History-Knowing the Past and talking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2009, p.39.

小谷賢, “Japanese intelligence and the Soviet-Japanese border conflicts in the 1930s,” The 33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ilitary History, Cape Town, 2007, pp.131-137.